喇叭声里的缕缕情思

高振中

田家庵 老北头趣闻轶事

1949年10月1日，田家庵的人民群众在第一时间与首都人民一起听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一声音，是由田家庵发电厂的高音喇叭传出的。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田家庵发电厂安装了大功率扩音机，直接接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信号，通过高音喇叭转播开国大典实况。而蚌埠、合肥、芜湖等城市，都是延后数日，通过庆祝集会，用扩音设备重播大典录音。田家庵电厂的大喇叭，在安徽大地首次实现实时转播，这是老北头的高光时刻。

淮南广播电台在安徽也是具有开拓性的。1949年1月18日淮南煤矿解放，不久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淮南煤矿局的无线电台。1950年5月1日，经中央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批准，淮南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是安徽解放后第一家广播电台。1951年，淮南广播电台迁至合肥，与省台合并为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老北头的人们从田家庵电厂的大喇叭里，听北京的声音、传电台的新闻，先知先觉的优势就在这里。

20世纪50年代，有线广播开始发展。市广播站设在田家庵公园路丁字巷，后迁址到朝阳路市人委办公楼。虽然广播录音设备比较落后，但广播节目办得有声有色。除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省电台的节目外，自办节目有《全市各广播站联播》《对工人广播》《对农村广播》《天气预报》《听众之友》《听众点播》等几十种；文艺节目有《每周一歌》《教唱歌》《音乐》，还重点办了《百花宫》，以播送市内业余剧团的节目为主。每天早、中、晚3次播音，共计10个半小时。

1957年，市广播站沿淮河大堤架设了长达45公里的广播专线，各大企业也都建立了广播台站，全市形成了完整的广播网。工厂、农村都有大喇叭传送广播信号，也播放自己的大事小情。那时报纸、收音机普及率极低，听广播成为居民家庭重要的生活部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广播喇叭让人人成了“秀才”，可以媲美今天的手机网、微信群。

广播喇叭是当时唯一的大众信息和文化娱乐渠道，也是家庭期待的必备物件。60年代中期开始，小喇叭进入老北头的家家户户。

入户安装广播喇叭，需要从广播电线杆上接出入户线，再加一根地线埋入屋里地下，声音微弱时要给地线浇水以增强信号。墙上安装拉线开关来通断喇叭。家用喇叭有两种：木盒的广播匣子音质好，外面有五角星装饰木壳，条件较好的家庭才能安装；更多的是碗状黑色纸盆喇叭，成本低廉，在老北头大范围普及。每户收取2元设备费、每月1角收听费，困难家庭免费安装。

从此广播喇叭与老北头形影相伴、不离不弃。早中晚有它的呼唤，时光中有它的叮咛，岁月里有它的号角，成长里有它的陪伴。

1965年后，每天早晨单位的大喇叭就会播放《东方红》乐曲，接着在《歌唱祖国》的过门曲调后，播放《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这是了解国内外大事最重要的渠道。晚上则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结束一天的广播。固定的新闻联播时间，你在田家庵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不同单位的喇叭播出同一个声音，绝不会漏掉播出的内容。

工厂农村的广播喇叭，是重要的传播窗口。企业的大小事都在喇叭里传达，有的工厂没有会议室，通过各车间的喇叭，一样可以开会做报告。到了赶高产、争高峰的时候，喇叭里的歌曲从早响到晚，让人们浑身有干劲。农村安排农活、抢收抢种、防雨抗冻、上河坝、挖塘泥，都是挂在村头大树上的大喇叭呼喊，家家户户的小喇叭也同步响起来。

小喇叭给全家带来了太多的乐趣。70多岁的奶奶看着喇叭出神：小木匣子怎能有“咚咚锵锵”的一台戏？她高兴地说：“过去只有皇亲国戚能天天听戏，我们逢年过节碰巧能听戏，离戏台远还听不清。”她拉了下喇叭开关：“如今在家一开关，里面吱吱呀呀地在耳边唱起来，这样的生活到哪找呀!”

特殊时期，样板戏火热，小喇叭一打开，《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戏曲就从里面飞扬出来。听得耳熟能详了，人人都跟着哼唱几句，这成了那个年代难忘的记忆。

长篇小说连播是大家喜爱的节目。每天到时间，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播送《欧阳海之歌》《人生》等长篇小说，一家老小围着小喇叭，把它当做一日三餐来享受，听起来引人入胜，一段也不愿放过。

广播节目里还有《每周一歌》，一个星期播送一首歌曲，大家从聆听到熟悉再到跟着唱，像《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都是跟着《每周一歌》学会的歌曲，至今还可以随口唱出来。

小喇叭也传来过令人悲痛的哀乐。1976年1月9日，广播传出沉重、缓慢、悲哀的声音。几十年没有国家领导人去世，突然是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人们先是感到陌生震惊，继而陷入无尽的悲痛。每家每户的哭声，伴随着广播声，在寒冷的冬夜里回荡。那个冬天，小喇叭传出的哀乐寒彻骨髓，人们举着白花、抬着花圈，向为人民劳累一生的周总理致哀。那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老北头也不例外。

1976年金秋之后，小喇叭传来的是久旱逢甘霖的声音：立即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让一代青年圆梦理想；为全国数百万“四类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党等方面一律平等。还有学习英语的洋腔调，女排获胜的呐喊声，小喇叭里更多的是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声音，那代人永远记在心头。

80年代，正是有线广播最鼎盛的时期，刘兰芳的经典评书《岳飞传》《杨家将》，在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转播，老北头的人们守候着准时收听，造就了“万人空巷”的盛况。有些人来不及回家听，就随便到路边传出声音的人家去凑合。主人很客气，笑着递个板凳：“评书要说半小时，坐下听。”小喇叭就这样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商业广告及听众点播也流行起来。“某某某厂长又笑了!”往往和推销啤酒、白酒相关。年轻人谈恋爱，花钱为自己心爱的姑娘点歌，喇叭里传出：“下面是某某先生献给某某姑娘的一首歌……”，会促进恋爱走向高潮。碰巧家人从喇叭里听到姑娘有谈恋爱的苗头，也会怪罪小伙子的急躁。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一道风景线，喇叭声声带给人们很多的欢乐。

随着收音机、电视机的普及，加上城市建设、道路拓宽，广播线路老旧锈蚀，广播喇叭走到了历史落幕的时代。

淮南不但是安徽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其播音员水平在全国也不低。在北京组织的全国播音员培训班上，方明、雅坤、葛兰等播音艺术大师，对淮南播音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鞠萍等人那时还年轻，对参加培训的淮南播音员敬佩不已。淮南人在央视、中国传媒大学工作、任教的也不少，都各有成就，不负乡梓。

小喇叭有宏大的叙事，更蕴藏着细微的情感。走在老北头的道路上，一些老旧的房屋还在，触景生情，耳边又回响起绵绵不断的喇叭声，脑海里又浮现出无法忘怀的缕缕情思。

八公山冬韵

妙 青

八公山静默地立着，远远看去，像是淡墨在宣纸上洇出的一痕。走得近了，才感觉出那静默里的深——一种被岁月淘洗过、滤尽火气的沉着。

风是清的，带着淮河平原独有的、水汽饱满的寒意，拂在脸上，不锐利，倒像一匹凉滑的旧绸子，缓缓贴过。

路是石阶，不甚齐整，缝隙里卧着些将化未化的残雪，踩上去有松软的、吃力的声响。两旁多是落叶乔木，枝条疏疏地指向铅灰的天空，瘦硬，有铁画银钩的笔意。偶有经冬不凋的松柏，那绿便沉郁得近于墨色，为这灰白的调子添上几笔凝重的顿挫。

空气透亮，能望见远处山腰间浮动的、纱一样的岚霭，悠悠地将山廓氤氲得恍惚。那场“风声鹤唳”的传奇，便沉在这片山石的骨髓里。仿佛能听见，千军万马的奔突与呐喊，已被时光酿成此刻无边的岑寂，只余下风过林梢时，那低沉而恒久的、潮水一般的呜咽。

正行走间，一阵幽香，清冷冷的，极淡，却又极韧，丝丝缕缕沁过来。是梅。转过弯，便见着了——不是一株两株，是疏落的一片，倚着向阳的坡。花是浅红的，不艳，像宣纸上用极淡的胭脂，含着水，轻轻一点，又小心晕开。在这满目苍灰的底色上，这红便显出温润的、有血色的精神。树下石径，有零落的花瓣，沾了细雪，便有了玉的质感。几个游人静静地立着，仰头看花，并不说话。一个年轻的父亲，将小女儿架在肩头，孩子的小手伸着，想去碰那最近的一枝，却又怯怯地缩回，只咯咯地笑。那笑声嫩生生的，脆亮亮，像一颗小小的石子，投进这山野古老的静默里，漾开一圈极细微、却极生动的涟漪。

这涟漪散开去，便撞见了另一番景象。山坳里一片略平的空地，几位老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手里是二胡、笛子，还有一把月琴。没有曲谱，也无人指挥，只是一个眼神，一点头，乐声便起来了。起初是试音般的零星几个调，有些生涩，随即汇成一片。是《梅花三弄》，又不全是，曲调在山风里有些散，有些走音，但那调子里有一种自在的、陶然的神情。拉二胡的老人眯着眼，头随着弓弦微微晃动，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像被暖阳晒软了的核桃壳。一个穿着鲜艳羽绒服的孩子，大约是被乐声引来的，摇摇摆摆走到老人跟前，将手里一枝不知哪儿捡来的、光秃秃的树枝，轻轻放在老人脚边。老人睁开眼，低头看看，嘴角的纹路更深了，手下琴弓一滑，那原本清冷的曲调里，无端地便渗进了一脉笨拙的、毛茸茸的暖意。

我也在近旁的山石上坐下，静静地听。琴声、笛声，混着风声、偶尔的鸟鸣，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分不清是笑语还是呼喊的人声，都交织在一起。历史那些森严的、带着兵刃寒气的面孔，在这一刻，仿佛被这不成章法的乐音，被孩童无心的馈赠，被冬日稀薄的阳光，轻轻揉化了，化成了空气里颤动的、有温度的音符。刘安炼丹的烟霞，苻坚溃退的烟尘，谢安弈棋时的落子声，都远了，淡了，沉入山体的最深处，成为滋养这片土地上寻常百姓过日子的、无言而深厚的底气。那些宏大的叙事，终究要落在一把琴的弦上，落在一个孩童的笑靥里，落在一碗将沸未沸的、冒着热气的平凡生活里，才算真的有了着落。

下山时，天光向晚。暮色从山脚漫上来，先是林梢染了紫黛，接着岩石的轮廓也柔和了，最后，整座山都沉入一种毛茸茸的、蓝灰色的安详里。回头望，来路已隐在苍茫中，只有那几株梅，在渐浓的暮色里，还依稀辨得出一点朦胧的、温柔的影子，像是这沉重大山轻轻呼出的一口温热的气息。

山脚下，广场上已是灯火初上。不是璀璨的那一种，是暖黄色的、一团一团的光晕，从卖小吃的棚子里透出来，将人影拉得长长的。空气里弥漫着油香、糖炒栗子的焦甜，还有烤红薯那朴实的、让人心安的香气。那豆腐村的方向，更是灯火通明，豆制品的鲜味仿佛能随风飘来。这世俗的、热闹的、蓬勃的生机，与我刚刚离开的那片山野的岑寂，那乐声的幽远，那历史的苍茫，竟是如此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一边是千年的沉积与无言，一边是此刻的喧腾与呼吸，它们并不相扰，反而在这冬日的黄昏里，奇特地彼此成全，彼此映照。

我慢慢地走，将这山、那梅、那琴声、这灯火，都揣在怀里。这冬日的八公山，它的韵致，原不止在那萧疏的、可供凭吊的景物里，更在这古今之间绵长而平稳的吐纳里，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各自的方式，从容地安顿着历史，也热切地拥抱着生活的那份温情与智慧里。山还是这座山，可它已不只是历史的化石，更是此刻人间烟火的、温暖而坚实的背景了。



盘山秋韵 方守安 摄

八公山与九华山：地藏信仰的江淮脉络（下）

程晋仓

三

遗迹给出的启示是：传说虽晚起，地藏信仰扎根淮上的历史却由来已久。

后世相传，北宋时期，有高僧自洛阳白马寺慕名寻访“金地藏结庵遗址”，在八公山中营建白塔寺，并于山巅修建白石塔，一时名震江淮。应当注意，“慕名寻访遗址”这一建寺缘起，仅见于当代地方传说，北宋碑刻、清代旧志并无此记载；但白塔寺始建于北宋这一方志记载本身，已足以说明八公山一带至迟在十一世纪已有实体寺院。至于该寺北宋时是否即与地藏信仰直接相关，尚缺直接文献证据；但后世地方叙事将白塔寺与金地藏遗址相联，至少反映地藏信仰在此地有着较长的流传背景。

清嘉庆年间凤台县令李兆洛所修《凤台县志》已载八公山“道场多达数十处”，白塔寺专条记载则见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凤台县志》：“白塔山山巅有白石塔。文峰山之东为庙山，山上有白塔寺。皆北宋时所建。东坡《出颍口见淮山》诗‘寿州已见白石塔’即此。今塔庙尽废，仅遗址耳。”（“文峰山”一作“文风山”。）

苏轼这首《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作于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十月，诗人赴杭州通判任，由颍入淮途经寿州。北宋寿州州治在下蔡（今凤台），白塔山在州城西北二十二里，与舟行东行望见寿州山塔的方位大体相合。但此处须存些审慎：将东坡诗句中的白石塔认定为白塔山之塔，本是清《凤台县志》的断语；后世地方文史另有异说，或指为寿州城内崇教禅院（今报恩寺）石塔。此类分歧属地方文史考索，本文姑从方志旧说，不据此诗作定论。

方志记载至少确认：北宋时期寿州近旁确有白石塔与白塔寺，八公山一带至迟十一世纪已有实体寺院。结合后世白塔寺与金地藏遗址的地方叙事，可以推测地藏信仰在此地的流传可能早于现存文献记载，但北宋白塔寺本身是否即地藏道场，尚待更多材料证明。此后自北宋迄清末，塔庙屡经兴废；清末之后，仍不断有僧尼、信众在遗址结庐修行，道场规模不大，香火时断时续，直至“文革”时期断绝。

四

从北宋到当代，八公山与九华山的因缘并未彻底中断，在一位佛门大德身上得到凝练体现。

1999年底，白塔寺于原址附近复建，2001年8月底竣工，9月10日举行开光大典。寺中山门殿悬挂的红底金字“白塔寺”匾额，出自九华山仁德大和尚之手，相传这是他在世时最后的题字之一，被白塔寺奉为镇寺之宝。山门前牌坊匾额“东震三千”与楹联，则出自苏州报国寺弘法方丈手笔。

仁德（1926—2001），俗名李德海，江苏泰县白马（今泰州市高港区）人。1958年朝礼九华山，驻锡后山，住持九子寺；历任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1986年祇园寺恢复丛林制后出任方丈，并任九华山佛学院首任院长。晚年以古稀之龄发起建造九十九米地藏菩萨露天铜像，为二十世纪后期九华山佛教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间尤耐寻味：白塔寺开光定于2001年9月10日，仁德已于2001年8月在九华山圆寂，相距不足一月。他未能亲赴开光盛典，却以一纸墨宝，与这座淮河古刹结下一段可贵的法缘。题匾依托的是佛教内部的同源情感与地藏信仰联结。一位九华山方丈在生命落幕之际，能为淮上八公山古寺留下墨迹，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表明：在当代九华山佛教界人士的认知中，八公山白塔寺与九华山地藏道场之间存在可被认可的情感与信仰联系。

五

梳理至此，八公山与九华山的渊源，可分为三个层次辨析。

一是传说层面，“先八后九”所依托的《新罗国志》来历不明，纪年与唐代一手文献《九华山化城寺记》严重抵牾，在佛教史籍与历代九华山志中找不到对应记载，不能作为信史看待。但作为晚近地方民间叙事，它反映了八公山地区对地藏信仰主动吸纳、本土化改造的过程。

二是遗迹层面，白塔寺、白石塔始建于北宋，有光绪《凤台县志》记载；方志足以证明八公山至迟十一世纪已有实体寺院，地藏信仰在此地的流传可能不晚于十一世纪，这座寺院历经宋、元、明、清，香火时断时续而文脉绵延，直至当代复建，道场的空间延续性可以确认。

三是当代层面，仁德长老题匾、白塔寺复建开光，构成两山因缘在当下的一次具体接续，相关事迹有明确文献与公开报道可佐证。

应当承认，这一信仰渊源的重心始终在九华山一侧。九华山拥有自费冠卿《化城寺记》到历代山志完整连续的文献链；而八公山则处于地藏信仰传播的边缘地带。但边缘不等于无足轻重。八公山本有淮南王刘安炼丹修仙的深厚道教底色，四顶山帝母宫至今仍是江淮道教胜地，三月十五庙会绵延数百年不绝。三峰山茅仙洞汉代三茅修仙圣地至今香火不断，二月十九的庙会影响深远。自北宋起，一座寺院在此建立；后世地方叙事又将其与金地藏结庵遗址相联，遂使地藏信仰与本土道教传统比邻共存、各安其位。地藏信仰如何以实体寺院为依托，在地方传说中与金地藏行迹相联，并与刘安仙话、碧霞元君、茅仙道君信仰共处于同一山体——这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正统信仰与地方民间信仰之间张力、融合的典型个案。

传说或许经不起文献考证，但传说沉淀下来的文化痕迹——方志记载的淮上白石塔、苏轼诗中远望的白石塔（无论是否即白塔山之塔）、九华山大德留赠的墨宝、断续千年而今再度接续的香火，都是真实存在的。八公山与九华山的渊源，最值得书写的是两山如何以地藏信仰为线索，各自生长出迥异的宗教人文景观，跨越江淮，遥遥回望。

“楚相断蛇”与“狐丘之诫”

周 强 杨 倩

典说淮南历史 第一季

孙叔敖既是楚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对淮南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给淮南人民留下的丰厚遗产芍陂（安丰塘）至今还泽惠当地人民。

孙叔敖曾三次出任楚国令尹（宰相），并以中国循吏第一人的身份登上春秋历史舞台。“循吏”就是遵奉法律、按照情理办事的官吏。孙叔敖所以成为天下第一循吏，是由他的政治品质和道德操守决定的，因孙叔敖而产生的成语典故很多，今天先说说他在出任令尹之前发生的且能足够体现他基本素质的系列故事。

其一，楚相断蛇。这个典故记载在西汉贾谊《新书·春秋》中，故事说，孙叔敖小的时候心里就想着别人。有一次出门，路上看见一条两头蛇，孙叔敖将蛇杀了埋掉后回家，哭着对母亲说：“我听说人见了两头蛇就会死去。刚才我看见了两头蛇，恐怕我也要离开母亲而死了。”母亲问他蛇现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我担心别人见到这条蛇也会死去，就把它杀掉埋了。”母亲说：“你做了好事，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不要担心。”多为别人做好事，这就是母亲对他最朴素的家风教育。后来因为平安无事，孙叔敖认为这是自己做好事的结果，于是更加相信母亲的话，做了更多的好事。这个故事发生时，孙叔敖岁数还很小，离楚相还有很长的时间距离，后人说“楚相断蛇”，实际上是说他从小就善做好事。

其二，动心忍性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孟子·告子下》。虞舜、商王武丁相臣傅说、商纣王重臣胶鬲、齐国宰相管仲、楚国令尹孙叔敖、秦国相国百里奚都是平民出身，孟子列举了他们当官前的身份后说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样就可以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性情（“动心忍性”），增长他的才干。讲述了一番大道理之后，孟子又谆谆告诫说，一个国家，如果国内没有贤臣，国外没有强敌，常常容易灭亡，这就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教训。作为成语，“动心忍性”表达的意思是，不顾外界阻力而坚持下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比较常用，表达的意思是，忧患能磨炼人，使人发奋，因而得生。安乐使人沉迷享受，丧志怠惰，因而致死。

其三，狐丘之诫。孙叔敖的名声越传越远，于是被举荐为官。楚国老百姓听说孙叔敖将要出任高官，都很高兴，相信他一定能治理好楚国，于是贾谊评价说，孙叔敖“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但孙叔敖自己却非常冷静，《列子·说符》和《淮南子·道应训》都说到“狐丘之诫”的典故：孙叔敖即将赴任时，年高德劭的隐士狐丘丈人对他说：有三种情况会招致社会上对你的怨恨。一个人地位高了，会遭到人嫉妒；官做得太大，君主会不放心；待遇高了，承担的责任就大，招致的仇怨也就多了。针对狐丘丈人提出的“三怨”，孙叔敖稍加思索，提出自己的应对之方：我的地位越高越要谦虚，要对别人更加尊重；我的官越做越大，我要更加小心，不能有一点傲慢；我的待遇虽然越来越多，但可以用来帮助更多的贫困者。我以后就用这些做法来免除“三怨”。老者听了孙叔敖一番话，连连感叹说，这种连圣君唐尧、虞舜也会感到苦恼的事情，您竟然能找到这样好的对策，这就是“狐丘之诫”典故的由来。

西汉刘向《说苑·敬慎》还记载了一个类似故事。有人担心孙叔敖当官后会发生变化，于是变着法来敲打他。孙叔敖上任那天，国都中的吏民皆来祝贺，却有一位老者粗衣白冠前来吊唁。孙叔敖整理衣冠迎接，非常谦虚地说，“楚王不知道我没有才能，派我担任令尹，大家都来祝贺，只有您最后才来，一定是有话对我指教？”老人说：“人身份贵却对人傲慢无礼，百姓就会离开他；官位高却擅自专权，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厚却不知足，就会招致祸患。”孙叔敖恭敬行礼说：“请您继续赐教！”老人说：“地位越高，态度要越谦虚；官职越大，处事要越谨慎；俸禄越厚，更不应索取分外财物。只要您谨守这三条，一定能将楚国治好！”孙叔敖诚恳地谨领受教，在楚国老百姓的期待中开始了执政生涯。